

往事如昨

父亲教我写春联

康勤修

过去农村过年最具仪式感的，莫过于家家户户贴春联，如果碰上大雪的年味，乡村人家满院子贴着红红火火的春联，把院落打扮得多姿多彩、满院生辉，到处尽显生机与希望。

儿时过春节对于我而言，最快乐的事情莫过于帮父亲贴对子（春联的俗称）。及至我年龄稍大一些，父亲把他所掌握的有关如何写春联、贴对子的知识传授于我。这我对如何写春联、贴对子的传统文化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。可以说，父亲是我年少时学写春联的启蒙老师。

起初，父亲总是不厌其烦，手把手教我如何提笔握管，如何写蚕头燕尾，如何写“割脚刀”（之字形），如何裁对子、折叠对方等。以前父亲对我说，写对子讲究“穷签子（横联）富对子”，即横联纸要小，对子纸要肥等，可惜我那时稀里糊涂，似懂非懂地也不知求教父亲。

每年春节写对子的时候，为了不浪费写春联用的大红纸，父亲总是从村代销点里多买回几张白纸。我感到纳闷，一次忍不住问父亲为啥买白纸。父亲笑而不答：“你不懂，回家就知道了！”

我们爷俩一回到家里，父亲就开始忙活开了，他先把白纸折叠，裁剪成对子的样式，然后让我照着他的样子，用另一张白纸反复练习如何叠纸方、裁对子。至此，我终于明白了父亲的用意，原来他是怕我浪费稀有珍贵的大红纸啊！

父亲教我写对子的时候，也是极具仪式感的，一般选择在腊月二十八九夜深人静的时候，那时干扰少。父亲郑重其事地擦抹干净吃饭桌子，把煤油灯捻子拨得亮亮的，然后，再把煤油灯放在一只倒扣的黑瓷碗上。父亲总是说“灯高下亮”，这是很有道理的。

我第一次学写对子是父亲裁剪的对子纸，等父亲裁剪完红纸，他又替我磨墨、压纸，让我来写对子。我在桌子的一边写，父亲在桌子的另一边凝神静气，鼓励我大胆落笔，一边替我往他那边拉红纸，这样不至于让墨汁粘住了对子。我每写好一副对子，父亲总是细心地把我刚写好的对子拖到地上晾。等我写完了，地上也已晾了一地。等对联晾好后，父亲会按次序一副副叠起来，放在簸箕里盛着，准备年三十早上贴对子。

大年三十早上，母亲打好一锅糍糊后，我用双手端着，跟着父亲贴春联。灶王爷（灶君）是一家之主，贴春联需要从他这里开始。一般而言，对子往往这样写着，“上天言好事，回宫降吉祥（或下界保平安）”，横批是“一家之主”。家里的牛栏猪圈上，往往贴上“牛羊满圈栏，积肥如高山”，横批是“六畜兴旺”，门芯上贴上“好大肥猪”等吉祥语。

每年写对子时，父亲都让我用横批一样大的红纸，写很多吉祥语，或者小福字等等，比如，家里的粮仓上贴上“五谷丰登”，或者“余粮满仓”“仓龙聚会”等；大门前的山墙上贴着“抬头见喜”或“出门见喜”等吉利话；床腿上贴着“身卧福地”“身体健康”等祝福语。还有，家里的水缸上要贴上“青龙大吉”或“细水长流”，磨盘上贴上“白虎大吉”。

年三十贴春联，往往一贴就是大半天，我和父亲爬上高上低、跑前跑后，忙得不亦乐乎。每年春节贴完了春联，满院子红红的春联十分好看，到处是一派火红的过年景象。我贴完自家的对子后，还不忘高兴地跑到大街上，欣赏一下街坊邻居家的新春联。我一副一副地驻足欣赏并默念起来，以期博采众长，来年把家里的春联写得更好。

记得有一年春节，家里大门上贴的对子是我写的白居易诗句：“日出江花红胜火，春来江水绿如蓝”，横批是“福庆初新”，门芯子是“新年纳余庆，佳节号长春”，满以为会得到别人的赞扬。谁知，我把白诗首句错写成了“日出江山红胜火”，一字之差意境变了，结果被村里一位“老三届”给当场纠错了，羞得我无地自容。

如今时过境迁，一到年底快过春节的时候，无论是乡村的大集上，还是城市的新华书店里，各种印刷体的春联满眼都是，琳琅满目，买着省事，贴着方便。人们不再动手写春联了，但儿时写春联、贴春联的那些快乐往事，已深深刻在了我的记忆里。

俺村的代销店

胡建军

每年快过春节的时候，我就想起小时候村里的代销店。

小时候，老家的代销店在村子西头队部大院里，是与队部连在一起的两间土坯红瓦平房。代销店的店堂中间是一条又长又宽的1米多高的柜台，隔着玻璃可以看到里面所摆放的东西。柜台后有一排简陋的货架，靠墙而立，货架上分门别类摆放着针头线脑、蜡烛、火柴、电池、鞭炮、香烟、肥皂、味精、白酒、糖果、点心、学生作业本、文具盒等日用品，靠门口摆放着两口大缸，一个缸装酱油，一个缸装食醋，可谓品种繁多，琳琅满目，都是村里人生活的必需品。

代销店的老板是一个只有三十多岁，嫁到我家村没几年的孙姓小媳妇。她大脸盘，留着齐耳短发，身材微胖，走路四平八稳，很有气场派头，村里人都亲切地叫她“经理”。“经理”可不是个简单人，她头脑灵活，口齿伶俐，会打算盘，干事利落，迎来送往，很会办事。

在那个物资相对匮乏，精神相对贫瘠的年代，代销店就是人们最好的去处，自然而然也成了全村人气最旺的地方，我们小孩子管那里叫“站场”。只要开门了，人们就会踉踉跄跄进去，东家长，西家短，谈天说地，谈古论今，总有说不完的话题，一阵又一阵的欢笑声此起彼伏。只要人一多，“经理”就会瞅准机会，扔出四副牌招呼大家“五加保”，两块钱的牌成本由抽红而得。这边打着扑克，那边就推开了牌九，虽然只是几毛钱的赌注，但也是“吆喝”声此起彼伏，“争斗”兴致盎然，玩得不亦乐乎，即使到了吃饭的点也是意犹未尽，久久不愿散去。一些好喝两口的村民是小店里的常客，他们会经常光顾，和“经理”打过招呼，自己动手舀上二两散白酒，也不需要任何下酒菜，小陶碗一扬，砸巴两下嘴，用手再抹一抹，过过酒瘾，缓解一下劳动带来的疲劳。特别是过年过节，代销店门口就特别热闹，来买过年东西的人络绎不绝，我们小孩子有了零钱，就喜欢往代销点跑，买零食或买鞭炮在店门口放，内心充满了喜悦和欢乐。

由于顾客都是村里人，去代销店买东西是可以赊账的，拿了东西直接走人。代销店的柜台上专门有记账本，密密麻麻写着某年某月某日，某某人欠多少钱，等到方便或年关的时候，欠账的会来代销点还账。“经理”就会翻开账本，用算盘噼里啪啦一打，说出欠款数额，然后用笔划掉，不加分钱利息。而还账的人也根本不去看账本，这种默契和相互信任演绎着人与人之间的温情。

小时候，我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帮妈妈“跑腿”，去代销店买东西。因为那时家里条件困难，一年到头很少吃到好东西，肚子里的“小馋虫”就会蠢蠢欲动，有时就会“蹭”妈妈几分钱买块糖吃，滑溜溜的糖块与口腔亲密接触，丝丝缕缕的香甜在唇齿间尽情绽放，让人回味无穷。

我记得帮妈妈买的最多的东西就是酱油。妈妈给我准备的是小塑料桶，“经理”接过我的塑料桶把一个塑料漏斗塞进桶里，然后不慌不忙揭开装酱油的大缸盖子，把提子伸进去，小心翼翼提上来，习惯性地抖一抖，再倾斜提子，酱油就顺着漏斗流到塑料桶里，一提子为一斤，打几斤就是几提子，也不用称来称去。

改革开放后，市场经济给社会带来了巨大变革，代销店就渐渐冷落下来，慢慢地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之外了，“经理”也光荣“退休”了。如今，取而代之的是乡村超市，里面摆满了琳琅满目的商品，虽然物质很丰富，可再也找不回当年的热闹场景了。

没有母亲的春节

姜守浩

1968年的春节，一直铭刻在我的心中。

我1963年12月应征入伍后，1964年至1967年4个春节是在部队基层连队过的，而1968年的春节，则是我在青岛某军校执行任务中回老家过的。

那年腊月二十六上午8点，我从军校乘公交车至青岛火车站东的大港站上车。那时的火车速度较慢，青岛至海阳100多公里，火车运行两个多小时才到海阳站（徐家店）。归心似箭，4个春节没在家过，我多么想早点回家，看看老家的亲人，看看老家的新面貌。火车上，我从车窗向外看，冬天的坡地、丘陵，空旷静谧，收获完的庄稼地里覆盖着皑皑雪层，北风呼啸，田野里的雪沫在原野上飞扬。10点多火车到了海阳站，我一路小跑赶往徐家店汽车站买票。徐家店下午1点发车，汽车行驶了半个多小时到了朱吴站。

下车后，我带着提包向北翻山越岭往家里赶。我穿着军大衣，又穿着棉鞋，奔波十多公里，回到家里已是下午4点半了。虽然奔波得很辛苦，但毕竟回到了家，毕竟要在家里过春节了，这是我当兵后第一次回家。四年不见村子、不见老宅和家人，我觉得家里一切依旧，但又无比新鲜、亲切，连家里的烟火味儿我都觉得没有变。本来我1967年9月就准备探家的，因为那年8月我从七连调到杜家岛六连当了排长，战备紧，探家的事便向后推了。

进屋后，却见不到母亲了。我心酸泪涌，因为母亲5个月前去世了，年仅47岁。虽然我当时在乳山县海阳所公社茅山营房，离家不远，但那时交通不发达，需要两天才能到家。加上当时战备任务很重，我没有回家。

我是家中孩子里的老大，母亲去世时，最小的弟弟才7岁，最大的弟弟20岁。站在母亲住过的房子里，环顾母亲用过的锅灶、睡过的炕、母亲的大衣柜、母亲用过的煤油灯，我再也抑制不住奔涌的情感。3年多在部队军事训练、军事大比武、战备、摸爬滚打，我从没掉过眼泪，此时却潸然泪下，泣不成声。

到家后喝了点水，我便与弟弟们踏雪到西山去母亲墓前祭悼，按当地的风俗，请“母亲”回家过年。见到母亲在山坡上的坟墓，回忆母恩，心潮奔涌。我跪在母亲墓前，嚎啕大哭，23年养育之恩，3年多的离别之情，再次喷发出来。

海阳中部山区民俗文化丰富，当时是大队、生产队，经济体制是大集体。二弟勤劳吃苦挣工分，父亲在乡村供销社当经理，每月工资30多元，4个弟弟上学，日子过得倒也踏实。过年时，饭菜是继母和奶奶做的，按照老家的习俗，大年三十中午饭菜安排得很丰盛。关键是菜肴，上菜的顺序是：一鸡、二活菜、三鱼、四埋汰（猪头肉）。上了这4道菜后，又上了猪肉炖大白菜粉条、红烧土豆、红烧青萝卜、大蒜拌菠菜，都是大盘子大碗的。爷爷、奶奶、父亲、继母，加上5个弟弟和我，共10口人。因为我回家过年，年三十的午饭也给全家人带来了一些安慰和好心情。

1968年春节，是一个没有亲生母亲的春节，那景那情，永远定格在我脑海中了。